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我们的留学生活
(节选)



难忘黑夜里的那张脸

1995 的一个秋夜，张丽玲在结束了繁忙的一天后，已经睡下了。电话响了，张丽玲拿起电话，话筒里传来 W 的声音，沙哑、疲惫，吱吱唔唔说了半天，才说明白：“张丽玲，我想问你借钱……”

在留学生中借钱一事是最难说出口的，谁都不易呀。如果谁向别人借钱了，这个人肯定是出问题了。

W 来日本数年了，由于日语学校没念下来，失去了签证，“黑”了下来，没法在东京找到适当的工作，就到名古屋的乡下去找活干。W 是与妻子一同来日本的，夫妻俩都三十多岁，中国同乡都说不管 W 打工多苦，只要一想到他有一个那么好的妻子，一切都可以释然。的确，W 的妻子漂亮、贤惠、勤快，具备天下所有好妻子的一切美德，与 W 相亲相爱，是一对非常和睦的夫妻，在留学生中十分受人称道。夫妻俩虽然不富裕，但是并不缺钱，日子总是能过得下去。而且 W 并不直接认识张丽玲，是张丽玲日语学校的同学介绍来的。

敏感的张丽玲从 W 的声音中听出了问题，就在电话里对 W 说：“你现在在哪儿？……就在我家附近？好吧，我马上出来，你等着我，我想知道你为什么借钱。”

张丽玲在地铁站旁边找到了 W，W 站在路灯下的阴影里，脸上的表情让张丽玲感到恐惧和不安，沮丧、无奈、悔恨、绝望交织在一起，目光无神，头发蓬乱，昏黄的路灯光让他的脸显出死人一样的光。

“对不起，张丽玲，这么晚了把你叫起来，而且又是这种让人难以启齿的事情，可我实在是别无他法……我妻子跳楼了……”

夜深了，行人已经很少，只有偶尔经过的夜车还让人觉得喧闹，秋夜的凉意阵阵袭来，W 的话更让她全身一颤，一股毛骨悚然的恐惧感觉像电流一样传遍全身，头发和汗毛都要倒立起来。

W 的妻子可是到处受人称道的好妻子呀，怎么就会跳楼了呢？

“……不过我妻子没有死，只是断了脊椎骨，现在正躺在医院，我没存下多少钱，像我们这些黑人在东京没有钱是治不了病的，我周围中国同乡的钱我已经借了不少，可是还不够，我的朋友让我来找你……我妻子是一个好妻子。她住在东京，我去名古屋打工，隔一段时间回来一趟，可是前几天我妻子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让我一定要保重，我感觉不对，就跑回来，回家一看，妻子不在，家是空的。我四处寻找她，可是哪里都找不到。问熟悉的同乡，都说不知道，好几天没看见她了，到她打过工的地方去找，也没有。我急了，在东京的马路上跑来跑去，只要有一线希望的地方，我都去找了，可是没有……一连找了三天，我连眼睛都没合一下，后来终于在一个公共场所找到了她，她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对劲，只是人比原来瘦了，气色也不好。我找到她时就放心了许多，拉着她回家。我本想问她给我打那个电话是什么意思，也想问她家里怎么会那么乱，还想问她那几天她都在哪里，可是我实在是太困了，把她拉上地铁就睁不开眼了，我想睡一会儿，等睡醒了在再问她。我的手紧紧地拉着她，可是她几次挣脱开我的手，凑到地铁门边，似乎想逃走，我迷迷糊糊地又把她拉回来。我在半睡半醒中意识到我不能带她回家，一回家我就会马上睡个不醒，她就会有再跑掉，我就把她带到一个朋友家里，让她在里屋休息，我为了防止她逃跑，就靠在门上睡，

可是一靠就睡着了……我真后悔，如果能再挺一挺，少睡一会儿，也许她就不会做那种傻事了，可我实在困得要死，靠在门上就睡得昏天黑地……突然听到‘扑’的一声，我的朋友大叫：你妻子跑了！我还以为我妻子是经过门口跑掉的，我本能的反应就是出门去追，连鞋子都没顾得穿，光着脚跑到路上，可是没有我妻子的影子，我纳闷她怎么会跑得这么快，我只好回到朋友家里，想穿上鞋子再去追她，可是等我回到朋友楼前的时候，一辆救护车已经停在楼下，我妻子躺在地上，正在痛苦地挣扎……原来我妻子是跳楼跑的，我挡着门，她出不去，就从楼上跳了下去，她也真命大，竟然没有摔死。朋友替我叫了救护车，把我妻子送到医院，她的脊椎断了，需要动手术……我想不明白她怎么会变成这样，我们原来计划好的，等我再挣一点钱就回国了，可是她却不愿意走，她说当初从国内出来就没想到再回去。其实我们在国内什么都不缺，钱有，房子也有，开着两个铺子，她什么都可以不干，过老板娘的日子，可是我们还是出来了，没想到出来后变成“黑人”了，我是想回去，可是她反对，不回去就不回去嘛，我也没有逼她，她怎么能这样？生活又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张丽玲不忍心再让 W 讲下去，回家把她身上所有的钱和妹妹张丽烨的钱全都拿给 W，让他快去医院。W 手中拿着钱，脸上依然没有一丝笑容，行色匆匆地走了。看着 W 的背景消失在东京的黑夜里，张丽玲也转身回家，可是她的脚步非常沉重。她替 W 担心，也替 W 的妻子感到悲哀，她觉得心里像堵着一块石头，难受得有点喘不过气来。

把钱财输光的时候，就输人，过了一段这样的日子之后，与一个日本人“假结婚”，通过这种办法加入了日本国籍……

张丽玲当时听着 W 的讲述，心里翻江倒海。其实类似的事情她从前也不是没听说过，可是真要活生生地发生在她身边，她觉得可怕，受不了。中国人为什么要出来？出来了生活不下去为什么不想回去？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人，生活能力并不比男人差，可是为什么一些中国女人在国外变得沦落，丧失人格，以致于迷失方向，找不回自我呢？

这件事让张丽玲感到震惊。她越发想做一部反映中国留学生的纪录片，让国内的同胞们知道他们在国外的生活和苦乐悲欢。这件事让她下定了决心，不再犹豫，不管困难多大，一定要把纪录片做成。

突袭横山

心灵的磨难是无尽的，一天不把片子做起来，张丽玲的灵魂就一天不得安宁。张丽玲想到电视台借一台摄像机自己拍，可是由于她在日本远离了电视界，她只知道日本有一家叫 NHK 的电视台，她以为日本所有的电视台播放的都是 NHK 的节目，真要拍电视片了，她还不知道电视台在哪里，更不知道日本的电视台是不做节目的，日本的电视台只管企划、播放，节目的制作是由公司来完成的，许多电视台除了新闻部以外，其他部门甚至没有摄像机。

为了纪录片之梦，张丽玲决定自己去找日本的电视台和摄像机。通过一个日本朋友的介绍，张丽玲与一家电视制作公司取得了联系，该家公司听了张丽玲的想法，觉得有点意思，可以一做，但是人家说必须电视台给公司这样的任务他们才去制作，可是像这样 20 集的纪录片，日本的任何一家电视台都不可能立项，在 NHK，做 13 集这样的节目就要 6 亿日元的经费预算，而且民营电视台谁都不会把一个纪录片拍到十几集、二十几集。但是这个公司还

是觉得张丽玲这个人挺有意思，一个弱女子竟然有这样的鸿鹄之志，他们可以帮助她联系电视台。后来张丽玲才明白，这家公司是想让电视台做一个拍她的节目，这样电视台可以出经费，他们的公司就可以接过来，有活干了，可以拿到钱了。

经过一番联系之后，有一个制作公司的人对张丽玲说：“我们给你引荐了富士电视台，我们已经把这件事向富士电视台制作部的部长进行了汇报，部长把这件事交给副部长与你接洽。这个副部长是日本纪录片方面的大腕，每天都很忙，选一个合适的时间，我带你去见他。”

这位副部长就是后来对张丽玲和她的《我们的留学生活》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横山隆晴。横山隆晴出生于1953年，毕业于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进过著名的日立公司，做过银行职员，进入富士电视台后先在报道部做新闻记者，后来成了日本纪录片界最有影响的几个导演和制片人之一，把日本纪录片的所有最高奖项都得遍了，其中GALAXY奖得了12次。带张丽玲去的人告诉张丽玲，横山个性突出，不太好接近，只认片子不认人，可是如果片子能够打动他，他也会不遗余力地去做。

张丽玲在国内接触过许多电视界的大腕，一个比一个牛，叫人不敢接近，想必横山隆晴也可能是这种人，鼻子一哼就能把人吹走。可是那也得见，见，可能会多一次机会，不见，却只能空等。

为了能打动横山隆晴，张丽玲做了充分的准备，把写好的企划书译成日文，把二十集的纪录片方案浓缩到一页，免得人家看不了两眼就烦了；而且选了一个星期五来见他，怕他在别的时间来不及听完就被别的事情拖走，周末的时间可以从容一点，谈到多晚都没关系。

1995年12月8日，一个普通的星期五，这本是一个平常的日子，当时的张丽玲也没有意识到这一天有多么伟大，可是这一天对《我们的留学生活》来说，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一天，张丽玲见到了横山隆晴，而且让这位个性鲜明的日本纪录片大腕的眼睛对中国人亮了起来，对张丽玲亮了起来，对《我们的留学生活》亮了起来。

张丽玲来到富士电视台，走进制作部办公室。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正在打电话，皮肤黑黑的，长长的头发，很瘦，正在对着电话发号施令，周围像垃圾堆一样堆着许多磁带、书、各种夹子等等，乱得不可开交。

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横山隆晴，从表面看来没有任何超乎常人的地方。

电话打完了，横山隆晴抬起头看了张丽玲他们一眼，并没主动打招呼，介绍的人对他说了几句，他就对张丽玲招着手说：“来，坐下坐下。”

可是电话铃又响了，他接着打，打完一个，回过头来对张丽玲说道：“我很忙的，有什么事快说，尽量简炼，最多不能超过半个小时。”

张丽玲看着横山隆晴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地打，心想，这人可真是个大忙人呀。

好不容易等到横山隆晴电话打完了，张丽玲把纪录片的企划书递过去。

横山隆晴看了几眼企划书，抬头问：“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当然是真话啦。”

“绝对不可能。”

这样的回答张丽玲是早有思想准备的，可是她不能就这么被打发了，她要用她的智慧和诚恳打动他。人非草木。张丽玲不相信横山会无动于衷。

张丽玲说：“我觉得也是不可能，不可能我才来找你，可能我就不来找你了。”

横山隆晴对这种心理小技巧却不屑一顾，他坦率地对张丽玲表达他的想法：“我不是吓唬你。为什么不可能呢？第一你不是专业人员，第二你没有钱，第三你没有设备，没有制作人员，第四，即使以上三点都具备，还有一条就会把你限制住，你现在是大仓商事的职员，大仓商事是一个非常传统、保守的公司，不会允许你来做这样的事情。”

张丽玲马上说：“我现在至少可以告诉你，这四点可以变成三点，最后一条不成问题，如果大仓反对我做这件事，把我开了，我绝对有这个思想准备，而且我绝对能够不要这份工作。想做一件事情，如果连这样的思想准备和觉悟都没有，我是不会来跟你谈的。”

横山隆晴惊讶地停顿了一会儿，下意识地看了张丽玲一眼，颇感惊讶地说：“你这个人挺有意思的。”

横山隆晴接着又看张丽玲的拍摄方案。

敏感的张丽玲马上发现了横山隆晴心有所动，准备采取新的攻势，可是没想到横山隆晴从拍摄方案上抬起头来，提出了更为强硬的拒绝理由：“我坦率地告诉你，我对你要拍的中国留学生不感兴趣，你是我见到的第二个中国人。第一个中国人是我在早稻田大学时见到的，他经常出现在我身边，自我感觉良好，好像比谁都优越，我烦他，没跟他说过多少话。”

面对这样的问题，张丽玲似乎一时找不到用什么话来应说横山隆晴，只好沉默着听他讲。可是横山隆晴并没有接着说下去，而是让旁边的一个摄像师架起一台摄像机对着张丽玲，然后对张丽玲说：“我对你这样一个在公司就职还想要做这么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的人有些兴趣，要是你不在意的话，我先让摄影师把我们现在的场面拍下来，可以吗？”张丽玲对横山隆晴的行为感到不理解，可是不知道该不该提出反对意见。其实这对横山隆晴来说很正常，凭他作为一个富有经验的纪录片导演，也许他觉得这样场面会有一些特殊的意义，如果不拍下来，会损失什么，所以他凭着本能这么干了。他又对张丽玲说：“不过我觉得你这个人很有意思，真的很有意思，超出我经验范围。我现在还不能说我会不会支持你。”

横山隆晴接着对张丽玲说：“我想听听你对你的纪录片的设想，尽可能说得简单一点。”

张丽玲没有委屈求全，更没有可怜巴巴地求人，而是“欲擒故纵”地说：“有一点我要事先说明，你一定要把我的话听完，等你听完我的话，如果你还不打算做，我一点遗憾都没有，而且还依然会为见到你感到荣幸，前提是你一定要把我的话听完，如果你不打算听完我的话，我宁可不说。”

“不就是要拍这么一个纪录片吗？”

“不简单。这不单是一个纪录片的事，而是一段历史，是中国人近二十年走出国门的历史，也是中国人近百年来向日本学习的历史。中国人最早来日本留学是在清末，中国人是抱着向你们学习的目标来的，到现在已经将近一个世纪了，等我们的片子做完播出时正好是一百年，这一百年有许多事情值得总结，这是我们做这个片子的初衷之一。我们这一批留学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出来的，为了自我人生价值的改变，为了实现自己的一个愿望，一个梦，也许我们的志向比不上先贤们那么远大，但是我们在中国与世界的沟通以及中国向世界渗透方面所起的作用，绝不亚于一个世纪前的先人

们……对中国而言，我们是冲在时代前面的，我们充当了这个时代的先驱者。在任何时代，先驱总会头破血流的，成功也好，失败也好，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将会伴随我们一生。我们在国外的生活是非常尴尬的，既不是中国人，又不是日本人，这中间有断层呀。我们这些留学生知道日本哪些地方不了解中国，也知道中国人哪些地方不了解日本，至少比在中国的中国人和在日本的日本人了解得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段历史，而且是一段不应该被忘记的历史。而你们日本人到我们中国留学时在唐朝，一千三百多年以前……当一个人走过去再来回顾这一段历史时，只能是回忆，如果有一批人意识到这个问题或者有能力把这一段历史记录下来，几十年之后就不至于只剩下回顾。虽然它只是一段短暂的历史，但它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中国将来与世界接轨，都有不可磨灭的作用，是非常有意义的，如果你能协助我来做，你就成了跟我一同进入这段历史的人，虽然你与中国没有任何关系，至少我们这一批留学生会感谢你。但你说我是你见过的第二个中国人，那么你一定不知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更不知道中国有改革开放这回事……”

电话仍然一个一个地打来，横山隆晴只好不断地接电话，可是慢慢地他对张丽玲所讲述的内容产生了兴趣，对电话开始不耐烦了，不断地推掉一些事情。张丽玲在旁边可以清楚地听见他拿起电话后听不上半分钟就说：“不行，我现在正有事，明天再说吧。”挂上电话马上就转过头来问张丽玲“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改革开放了你们为什么就要出来？”、“你们留学生在日本又怎么生活？”之类的问题。

就像横山隆晴对中国不了解一样，原来张丽玲对富士电视台也一无所知，直到她见到横山隆晴的时候她还以为富士电视台肯定是富士胶卷公司下面的一个很小的电视台，否则世界一体化的进程发展到了如此之高的水平，横山隆晴怎么还会连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都不知道？但事实上富士电视台是日本最大的一家民营电视台。

直觉和经验告诉张丽玲，从横山隆晴的眼睛里透露的信息说明，他开始想知道中国的事情，他的好奇心促使让他急于想从张丽玲这里了解中国。聪明的张丽玲抓住了这一机会，不仅告诉他中国现在的变化，而且还对中日关系大胆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中国和日本虽然是邻国，表面看起来它们的文化和现实生活都是很接近的，似乎没有什么差异，其实思维方式的差别是非常大的，这种差异，甚至比中国人与美国人之间的差异大得多，但问题是大家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谈话出人意外地一直进行了四个小时，远远超出了横山隆晴自己设定的半个小时的界限，可是他似乎还有许多问题要问，直到很晚了，富士电视台的人早都下班回家了，他们也感到肚子饿了，横山隆晴才恍然大悟似地想起来：“哎呀，光顾谈话了，饿了吧，咱们吃饭去。”

横山隆晴带张丽玲来吃一种日式自助饼，这是一种类似中国大排档的小吃，需要自己动手做，把准备好的青菜和鸡蛋放在一个摊开的面饼上，放在平底锅上去煎，吃得人满身都是烟。第一次见面请一个女孩子来吃这种低档的东西，这在日本不能算是太有礼貌的事情，而张丽玲还穿着上班时穿的衣服，这多少有一点让张丽玲感到不太合适，可是当时张丽玲是来求人的，人家请她吃饭已经不错了。

后来，这顿饭成了张丽玲“攻击”横山隆晴的话柄：“第一次你请我吃饭就让我吃那个！”

饭间，横山隆晴不断问张丽玲有关中国的事情，对电视片的事情反而不提了，张丽玲只能跟着他的思路走，尽可能回答他的问题。吃过饭，横山隆晴对张丽玲说：“也许我会帮助你，你不要着急，我会给你打电话的。我要回摄影棚工作了。”

这就是张丽玲与横山隆晴的第一次会面，一次在无意之间创造了历史的会面，一次在中国和日本之间架起一道新的桥梁的会面，一次让中国人和日本人都会感动的会面，而且也是对张丽玲和横山隆晴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会面。

《我们的留学生活》播出后，横山隆晴在日本接受中国新闻记者的采访，又谈起张丽玲第一次去见他的情景，感慨不已，而且与张丽玲对记者的说法颇有一点不同：“1995年12月，张丽玲第一次来到富士电视台找我。那时富士电视台还在新宿区河田町老地址（两年前迁移到东京湾，现在坐落于台场海滨——笔者注）。这是一次不速之访，来得非常突然。她问我你就是富士电视台的横山隆晴吗？她说她想拍一部纪录片，她从朋友的朋友口中知道我在制作纪录片，我在日本电视纪录片界还有点名气，她请我借给她摄像机，说是想为在中国的电视台播出而拍一部纪录片，朋友说向横山开口可以借到。我问她拍过纪录片没有，她说连一部片子都没有拍过。这就是我和张丽玲的初次见面，我想这个人是不是发疯了，那一口半生不熟的日语，还带着地地道道的留学生的稚气，对纪录片一无所知。当时，张丽玲才二十八岁。我仔细问了她的计划之后，告诉她，我对拍留学生，特别是中国的留学生的事情，一点也不感兴趣，但我认为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她想表现的东西，很有价值，所以，我向她许诺在可以做到的范围以内帮助她。”

铤而走险老虎机房主

冯明的长相比较福态，五官端正，脸颊丰满，双眼皮，留传统分头，头发微有卷曲，个子比较高，穿一件黑夹克。他爱说，喜欢思考问题，也愿意有人听他诉说。

冯明说：“我现在真的是对自己有一种自卑感，好像每天就是为了一点钱在这里呆下去。有时候翻开电话簿，通讯录，想给朋友打个电话，可连打个电话的勇气都没有。我把自己比喻成角落里的人，我想我代表的也是一大批人。这也是我们这个角落里的人的一点酸甜苦辣。你们能把我们的心情表现出来，太感谢了……”

从此，摄制组开始了对他长达两年多的跟踪拍摄。

冯明当时正在做一种非常危险的事情，在老虎机房打假卡。

老虎机是一种赌博机器，中国人也把它叫角子机，一般是投掷硬币启动机器。日本式老虎机的玩法，是客人先用现金购置游戏卡，再把卡插到机器中，进行游戏。每当机器转出同样一组图案时，老虎机便一次释放出相当于6000日元左右的弹子。这种老虎机房，在东京街头随处可见。

1996年初，日本兴起了一股使用伪造游戏卡在老虎机牟取暴利的风潮。假卡制造者将使用过的废卡进行技术处理，然后以正常价格的10%秘密出售。购入假卡的人，凭借便宜的假卡，到老虎机房来赌博获利。

这种制造和使用假卡的行为，触犯了法律，引起日本警视厅密切注意。那一段的新闻媒体上，关于假卡的报道非常多。造假者的照片常常登上大报的头条新闻，“破获伪造团伙”一类大标题非常醒目。

但在这种风声鹤唳的紧张气氛中，仍有人知险而行。冯明就是其中的一个。

1996年2月的一天，摄制组来到和冯明事先约好的地点。

到了预定的时间，冯明摇晃着身体从一家小店走出来，他仍穿那件黑皮夹克，走几步，看一眼手表。街头上，两个日本青年各自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日本最大美容院，大优惠，只需1400元”的字样。他们站在人行道上，不停地拦住过往行人，往行人手里塞小传单。

这是一个不景气的年代，每个人挣钱都非常不容易。

摄像机紧跟着冯明来到一个公用电话亭旁，冯明拿起电话，用中文说道：“我昨天晚上定的卡拿好了没有？拿好了是吧。今天的卡质量怎么样？昨天我打了很多卡，都吃卡，今天没问题的话，我还是再加十万吧，一共要六十万，你给我都拿五千的吧，再过15分钟，还在老地方见。”

所谓老地方一般设定在交叉路口、车站等人多的地方，好掩人耳目。冯明解释说，他从前一直是埋头打工的，打假卡还不足两个月。

冯明带着摄制组来到一个公共汽车站附近，冯明站在等车的行人之间，很悠闲，偶尔看一眼来人将会出现的方向。

15分钟后，一个骑摩托车的人出现了，头戴白头盔，身穿黑夹克，夹克背上画着白色佛祖图案，摄像只能拍他的背影。

冯明朝来人摆摆手，动作不大，没有紧张，也没有兴奋，冯明是一个老练的人，行事稳重，做什么事都有条不紊。

摩托车手骑在车上，将卡递给冯明。冯明接过假卡，先把夹克上衣拉链拉开，把卡装入上衣内袋，再从裤兜掏出钱，对方接过钱，两人摆摆手，摩托车手就走了。

冯明说，干这一行，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纯现金交易，全部是单线联系。

冯明手里拿着一个易拉罐，道：“我今天拿了六十万日元，卡的实际数额是六十万。”

张丽玲问：“那你实际是花了多少钱？”

“买的当然很便宜啦。不到三万块日元吧……”他说话的声音模糊不清，视线也躲躲闪闪的，有些不好意思。

冯明从夹克内兜里拿出那个摩托车手给他的纸包，对张丽玲说：“这次拿的卡的质量还不错，这是三千的面额。”

说着他从纸包里取出一张卡，递给张丽玲。张丽玲还是第一次接触这种造假品，感到好奇。

卡是一张身份证大小的磁卡，一面是灰色，另一面一半蓝色，一半白色，交界处打了一个小黑洞，证明这是废卡。

冯明又递给张丽玲一张五千元卡，卡的背面也是灰色的，正面也是双色，一半绿，一半白，中间也有小洞。

冯明重复着同一句话：“这次质量还不错的，卡不好的话，勒手，勒手的话就容易卡在机器里……”

冯明用手反复挫着卡的下半部，以证明那张卡面是光滑的。

张丽玲指着中间那个大一点的小洞，问：“这个洞没有补起来怎么办？”

“这个洞没补，只好从洞的这面打起了。”

冯明把卡重新包好，放进皮夹克内袋里。

张丽玲趁势问他具体造假卡的事。

冯明说起这些倒不那么吞吞吐吐了，那种高层次犯罪的事，与他是无关的。“这个说起来就很复杂了，有专门冲卡的人，也有专门的二道贩子，也许三道贩子都有，反正最初拿卡的人，没这么贵的，估计钱的一大半儿都被冲卡的大老板给拿了，轮到我们这儿，冒着危险，赚钱又很少，跟他们比起来……”

“冲卡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张丽玲问。

冯明脸色一变，道：“冲卡这个人那厉害了，跟日本黑社会都有关系的。”

冯明又去给史国强打电话，仍是说中国话：“这几天还是老样子，你怎么样，你这两天没地方打卡是吧，这样吧，我刚拿了卡，你还是赶快过来吧……”

30分钟后史国强赶了过来。他戴着眼镜，头发留得较长，到脖子处，长得有点儿像日本人。

两人一起进入了一家老虎机房。

现在进入老虎机房是担大风险的。假卡风潮起来后，各老虎机房纷纷加强了警备力量，配备了最新的防盗设备。

这家老虎机房，一个穿白衬衣，年轻高大的保安虎视眈眈地看着游戏的人们。他头上扣着耳机，胸插微型麦克风，一根线联接到裤子后腰，上面挂着对讲机以及其它先进通讯设备。

为了便于随时逃跑，冯明在最靠近门口的位置上坐了下来，放入第一张假卡，那个保安就在他身边走来走去。

小史也选择了最靠近门口的位置。

很快，冯明的老虎机就被打开了。显示屏上，3个7并列在一起。开一次，相当于6000日元的弹子滚滚而出，银色的金属弹子发出密集清脆的声响。金钱的声响引起人的贪欲。

隔着几排老虎机的小史回头看着冯明，他好像没有打开，有点着急。

没有多久，冯明的座位下就堆满了弹子。

冯明玩了一会儿，虽然手气非常好，但也不玩了。为了安全起见，冯明从不在一个店长留。

冯明拿着店里出示的筹码，去换钱。换钱的地方在老虎机房外面，收款台管换钱的是一个中年男子，他满脸堆笑，殷切地数着钱，递出窗口。

史国强也出来了，也在高兴地数钱。

张丽玲问冯明赢了多少钱。

他指着刚出来的那个店：“刚才那个店，一个店。今天顺利，怎么也得上十几万以上，如果5点还大开的话，二十万突破了。”

不太走运的史国强把外衣脱了，搭在手上，甩着另一只手，似乎在甩掉坏运气，他不好意思地笑：“今天不怎么好，只是打个本钱回来。”

他把装进去的钱又掏出来，数了一下：“三万多……挣个交通费吧。”

史国强说：“去别的店再看看，时间还早嘛，再约别的朋友。这家店太严。”

摄像机跟在两人背后，拉开一定距离。

天渐渐暗下来，路上行人纷纷赶回家中。这两个没有合法身份的人，却逆人流而动，从一家老虎机店走向另一家老虎机店。但他们对老虎机房并不是很熟悉，只是碰运气。

他们终于找到了一家老虎机店，为了不引起警备的注意，两个人分别从两个门进去。

成为黑户以后，升学就职的可能没有了，挣钱就成了惟一的奋斗目标。

夜渐深了，东京城开始了灯火辉煌的夜生活。冯明和史国强从这家老虎机店出来后，也分手了。

冯明在街头孤零零地走着。35岁的冯明，至今单身一人，自从开始打假卡以后，他辞去了工作，从早到晚，一家店接着一家店走。

他走近一家店，左右看看，然后走了进去。

摄像只能隔着店外面的防护网拍摄。

街头墙上，某某大会倒计时牌上大电子表指针已指向11时10分。

每天的深夜11点，老虎机房关门后，冯明就在附近的旅馆投宿。这种漂泊流浪的日子他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

冯明走进一家外表看上去挺上档次的旅馆。

张丽玲他们跟了进去。

冯明今天谈兴很浓。他坐在旅馆房间的地板上，抬着头看着镜头，脸上带着无奈的苦笑。

“今年是第八个年头了。以前说抗战八年，我现在在日本，也扛了八年……一天多少也能为家里赚回几千外汇吧。”他低下头。

他拿出几张纸币，分成两份，一手拿一份。

“我每天出去，就带五千日元，买张三千或五千的卡，每天赚来的钱都存起来，我留下来的目的没别的，一个是赚钱，一个就是看看今后能干点什么事。回去以后，我肯定要发展，具体能干到哪一步，是另外一回事……也许今后还……有了钱以后还想往政治方面发展呢，要说我家里，父母都是国家干部呢……”

寂寞的夜晚，一个不甘寂寞的人。

陈麒：脚踏衬的上海人

陈麒，上海人，24岁，18岁就到日本，来日已经6年。他是城西大学的四年级学生，这是一所私立大学，每年学费约90万日元，合人民币约6万元，这笔钱全靠他打工挣。

1996年夏天，张丽玲到城西大学采访陈麒。

陈麒就读的是工学部，自动控制专业。课堂上，一位五十岁左右的教师正在讲课，陈麒用心地记着笔记。下课后，别人都在玩，他却勤快地擦黑板。

一位老师说：“留学生和日本学生的考试内容都一样，我觉得留学生很不简单，既要懂日语，又要懂英语，做笔记，做作业也必须用日文写，很不容易。中国留学生都非常努力，上课他们总坐在前面，成绩也都很优秀。”

中午休息期间，张丽玲问陈麒在日本最艰苦的事情是什么，他说：“就是睡不好觉吧，迷迷糊糊的。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睡三四个小时吧，星期六可以好好地睡一天，但是四年级就得准备就职，得跑就职说明会，或参加公司面接考试，这样一来，睡觉又少了一点，还要打工，一天8到10小时，挺累的。”

张丽玲同情地说：“很想好好地睡一觉吧？”

陈麒面带苦笑：“现在也睡不着了，几年下来人就变得有些神经质，生物钟给搞乱了，到四五个小时以后，就睡不着了。再睡的话就会很难过，就

这么回事。”

陈麒打工的地点在东京市中心的新宿区的高田马场，一家叫“Z”的夜总会，他是跑堂的服务生，他在这里打工已经四年了，除了店长，只有他一个服务生，每天晚上忙个不停，但他还满意，每小时一千日元的薪金，除去学费和房租，还能稍有节余。

工作时间是每天晚上7点到凌晨3点，陈麒四年居然没有请过一天假，就连每年的圣诞夜他也在店里打工度过。

每天在早晨3点半以后，陈麒才能回到在丰岛区椎名町租来的房子里，还要再看上一会儿书，8点半就得坐电车去学校了。

陈麒一进大学四年级，就开始为毕业后的就职做准备，但至今还未找到合适的公司，他拿出一张履历表让张丽玲看，说找工作从物色公司到准备资料全得靠自己。明天一大早，他将接受一家贸易公司的第二轮面试。他不想回国发展，觉得好不容易读了四年大学，总得在这里就职，学到实际的本事后，才考虑回国发展。

地板上摆放着一张长长的公司名单，竟然全是日本的一流公司。

三天后，陈麒去参加另一个旅游公司的考试，考场内只有一条长桌，一边坐着主考官，另一边并排坐着陈麒和另外三个年轻人。

主考官问陈麒：“请问工作对你意味着什么？”

“人生有许多内容，工作是不可缺少的……”陈麒的双手并放在膝上，很紧张。

走出考场，他告诉摄制组，进这家公司的希望非常小。

最后一次见陈麒，他已经大学毕业，到福特汽车日本分公司工作，这是一家跨国大公司，他说：“虽然是很苦，但也挺有趣的，别人不能这么过，我却能这样，觉得有挑战性。”

李芳：江西母女和解在东京

李芳，27岁，来日4年，东京外国语大学三年级学生。她家里很困难，兄弟姐妹七人，她排行老五，高中毕业后到离家万里的吉林读大学，毕业后回江西工作，然后又到日本，什么事都是一个人扛过来的。

她对摄制组讲述了她的历史：“小时候我曾被我妈抛弃过，那是文革时期，我刚出生，父亲又是右派，我妈担心养不活我，就把我抛到外面去了。尽管我知道不是我妈的原因，是历史的原因，但这还是在我心里留下了伤疤，对她我挺冷漠的，尽管我也知道我妈把我们养活不容易，应该好好孝顺她的，但我做不到。”

去年冬天，李芳得了严重的心脏病，至今尚未痊愈，但她还是坚持打工。她同时打几份工，最主要的那份是在东京最大的交通枢纽新宿站的一家快餐店里跑堂。

这家小店只有20平米，生意却出奇得好，每早能卖出上千份快餐，吃饭的人要排队，店主为了节约空间，只用了李芳一个跑堂。

从早上6点到9点，李芳穿着鲜艳的工作服，把快餐高高地举过头顶，在拥挤的顾客中穿梭往来。下工后，她每每都要累得直不起腰。

报酬是一小时900日元，外加一顿早饭，并不足以支付学费与生活费，所以，李芳还做着中文教师等工作。

日本的生活使李芳认识到，一个女人要自己支撑一份艰辛的生活，是多

么不容易，她终于体会到当年母亲的心情，最终与母亲和解了。

她说：“在这边的生活让我学到了很多，能够让我完全接受我妈，这次回国，我妈也挺高兴的。”

1996年的圣诞夜，李芳在教堂度过。她这天穿一件白衬衣，及膝的黑裙，手里抱着一份黑色乐谱，举着一根点燃的蜡烛，与一队教友走到教堂的前面，开始齐声歌唱。人们脸上表情肃穆，李芳虔诚地唱着，歌声甜美动人，充满了幸福宁静的慰藉。

柳林：憨厚的山东小伙

东京老街江户川区新小岩，有一所“学旺”日语学校，80%的学生来自中国。

1996年冬天张丽玲来这里拍摄，她对中国留学生们讲明拍摄意图，希望他们推举一位合适的人选。正是下课时间，人们忙着赶去打工，但还是很配合，哄笑着一致推出一位身材高大的小伙子。这就是山东小伙柳林，22岁，来日8个月，他相貌端正，性格和善，在班里人缘很好。

柳林下课后，先到附近的超市里买了最便宜的猪肉做晚餐原料，然后急急地赶往“天元整体院”，这里是他的堂哥开的按摩院，柳林在这里做按摩师。

一间大屋子里，柳林穿上白大褂为病人按摩，按摩得用力，看上去像揉面，他的堂哥在旁边指点他。

柳林说：“一开始来日本不会按摩，就在我哥身上一遍遍做，他教我，我还看我哥怎么做，经过五个月的学习，通过了他这里的考试，他就接收我来这里打工了。”

堂哥叫柳河，38岁，来日10年，说话也很爽气：“其实我完全有能力供柳林上学，不用让他工作，他要工作，也可以直接到我这儿来。但我没这么做，他来了我首先让他去饭店刷碗，我是想让他知道，每个留学生都是这么起步的。不知道这种艰难，他将来的奋斗就不会有动力。就这样，我宁愿他恨我，也让他每天去刷12小时的碗。”

柳林手上有一道疤痕，是刷碗留下的。

柳林自豪地说：“四月份回国的时候，我还给我爸我妈每天晚上做按摩，这每小时6000日元的服务，让我爸我妈也享受一下，每天都做。”

下班后，别人回家了，柳林就住在治疗室里，他说自己也想租个房子，吃得好一点，但是因为学费太贵了，他还是宁可吃点苦，存点钱。

1996年圣诞，柳林给摄制组看他女朋友的照片，还说：“我天天带着呢，今天我们要通长途。”柳林大大方方地说着，旁边的同学哄堂大笑。

